

■中国文学

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 ——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方 长 安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方长安(1963-), 男, 湖北红安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摘 要]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 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 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 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于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在质疑、批评中, 他努力探寻“五四”文学走出困境的方案。

[关键词] 成仿吾;《文学论》;质疑;“五四”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4-0551-06

—

“五四”作家的启蒙者身分使他们热衷于以自我、他人、社会和人生作为思考中心, 以审视与描写复杂而变动不居的现实。对于他们来说, 摆在面前需要正视的现实, 就是对自我与他人也就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本质属性做出新的界定, 对社会情势、人生处境进行研究, 考辨其形成根源, 描述其新的发展可能性, 对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各种思潮做出解释与选择, 对转型时期各种严峻的课题做出回答, 等等。周作人等在“五四”初期所倡导的写实主义, 落到实处, 就是要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对这种现实做出反应。于是, 在写实观念的驱使下, 文坛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写实潮流。

然而, “现实”本身的特性, 使这股写实热潮很快呈现出作家们始所未料的特征, 那就是热衷于对人生作哲学思辨, “注重思想”成为一种共同的趋向。当时的问题小说大都是以小说提出抽象的人生问题, 并给出哲学式的答案。诸如许地山的作品大都是“穿了恋爱的外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冰心女士和叶绍钧的作品企图解答人生是什么。”^[1] (第311页) 他们的初衷是“写实”人生, 而“人生观”探索使他们走向了非写实的观念化的议论人生。“问题剧”亦如此, 本是希望通过译介易卜生问题剧向新文学输入“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 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的“写实主义”^[2] (第246页), 然而“问题”意识的制约, 使“五四”问题剧演化成了“传播思想, 组织社会, 改善人生的工具”^[3] (第20页)。不惟小说、戏剧, 诗歌同样加入到了探讨“人生究竟是什么”和拷问自我生命的主潮中。刘大白的“我在哪里? 真的我在哪里?” (《旧梦·真的我》) 是一个纯哲学命题, 对于年轻的诗人来说只是一个谜, “人生是一个谜, 诗里表现的人生, 尤其是谜中之谜。我自己还猜不透人生之谜, 却把这谜中之谜给大家猜。” (刘大

白:《〈旧梦〉付印自记》)。诗在他那里成了抽象的人生之谜的载体,何谈诗味、诗情?徐玉诺吟道:“我为什么活着,能够运动的一件东西?我能够解答这个问题么?”(《杂诗十三》)显然他无力回答如此艰深抽象的命题。就连豪情万丈的郭沫若也常常发出“人为什么不得永生?”这样的“天问”。诗在试图解答人生现实之谜时遁入理性的王国,哲理诗成为一种时尚。

这种由“写实”追求而导致的非写实的哲理化潮流,比起晚清文学的政治化倾向,虽然文学意味要浓厚一些,但由于哲理大都飘浮于表层,不是由情节、人物和氛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所以这种哲理化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概念化、一种非文学性倾向,更何谈“写实”?“五四”文学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1922 年左右,“人生派”开始意识到这种哲理化的危害性,并试图借自然主义文学的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理念来救治这种非写实主义病症。一段时间内,法国和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被大量地译介进来,他们希望以自然主义的技术医中国现代创作界的毛病(第 353-358 页)。然而,“五四”初期文学的概念化倾向,绝非技术性问题,单凭自然主义客观描写技术是医治不了这种非写实潮流,正如温儒敏所说:“如果光是从技术上强调客观描写,也不能根治这种概念化的毛病,顶多是使某种思想观念的表达更加形象化而已。”^[5](第 47 页)不仅如此,自然主义的引入,稍不留心还会削弱作者的主体性,使创作不仅偏离人生启蒙的初衷,而且艺术上势必显得呆板、沉闷,失去原有的人生探究的激情。

二

在人生派试图以自然主义纠正“五四”初期文学非写实潮流稍后,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更为激进的姿态对这一潮流进行了质疑与批评。长期以来人们感兴趣的是成仿吾言说问题的激烈方式,而很少关注他所运用的理论话语及其来源,对其质疑、批评的具体情形更是缺乏学理性的分析。

其实,成仿吾的质疑、批评是以对于当时文坛来说颇具针对性和穿透力的理论话语为支撑的,这一理论话语来自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文论专著《文学论》。《文学论》1907 年 5 月由日本大仓书店出版,是继坪内逍遙的《小说神髓》之后日本近现代文论史上又一里程碑。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认为:《文学论》是“整个明治和大正时代唯一的最高的独创的”著作,“在思想的深刻性上,作家和文学家之中无人能及。”^[6](第 1-4 页)在中国,1931 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张我军翻译、周作人作序的译本。至于成仿吾,人们至今尚未发现他读过《文学论》的直接记载,那我凭什么说他的理论话语来自此书呢?

自 1906 年起,夏目漱石便于木曜日下午于书斋举行文艺沙龙,称“木曜会”,直到 1916 年 12 月去世为止。“木曜会”影响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作家和评论家,如高滨虚子、江口涣、芥川龙之介等。这一期间成仿吾正好留学日本,热衷于文学事业,并深谙日本文学,从常理看,他应该听说过“木曜会”,并由此引起对当时日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敬仰的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好奇与兴趣,从而读到夏目漱石在当时影响极大的文论名著《文学论》。然而,推测只是一种主观运思,证据并不充分。接下来我将通过文本对比,证明成仿吾的理论话语直接来自《文学论》。

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提出了自己基本的文学理论,用公式表示就是(F+f)。论著开篇便提出了这一公式:“大凡文学内容之形式,须要[F+f]。F 代表焦点的印象或观念,f 代表附随那印象或观念的情绪。然则上举公式,可以说是表示印象和观念的两方面即认识的要素‘F’,和情绪的要素‘f’之结合的了。”^[7](第 1 页)接下来,他将“我们平常所经验的印象和观念”分为三种:一是有 F 而无 f,即有智的要素而缺情的要素,如我们所有的三角形之观念,并没有附带什么情绪;二是随着 F 发生 f 的情形,例如对于花、星等的观念;三是仅有 f 而找不出与其相当的 F,如所谓的“fear of every thing and fear of nothing”。这三种中,他认为可以成为文学内容的是第二种,即[F+f] 这一种^[7](第 1-2 页)。

这一基本理论被成仿吾所接受,从其文论名篇《诗之防御战》中能得到证明。一、成仿吾使用了两个与夏目漱石《文学论》表述其基本观念的公式(F+f)完全相同的符号,即 F 和 f,并作如此解释:“F 为一个对象所给我们的印象的焦点(focus)或外包(envelope),f 为这印象的焦点或外包所唤起的情绪。”显

然，它们的所指与夏目漱石的 F 、 f 的所指完全相同。二、成仿吾用 $\frac{df}{dF}$ 表示出了夏目漱石对 F 与 f 关系的理解。他说：“这对象的选择，可以把 F 所唤起的 f 之大小来决定。用浅显的算式来表出时，便是我们选择材料时，要满足一个条件。如果 $\frac{df}{dF} > 0$ ，这微分系数小于零时，那便是所谓蛇足。这算式所表出的意思，如用浅近的语言说出，便是诗中如增加一句一字，必是这一句一字能增加全体的情绪多少。”他这里道出了两种情况，即 $\frac{df}{dF} < 0$ 和 $\frac{df}{dF} > 0$ ，并暗示出了第三种情况 $\frac{df}{dF} = 0$ ，这三种情况与上述夏目漱石所谓的“经验的印象和观念”的三种情形完全相同，即 $\frac{df}{dF} < 0$ 表示“有 F 而无 f 的时候”， $\frac{df}{dF} > 0$ 表示“随着 F 发生 f 的时候”， $\frac{df}{dF} = 0$ 表示“仅有 f 而找不出与其相当的 F 的时候”。这说明成仿吾对夏目漱石将“经验的印象和观念”分为三类的观点完全认同，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三、三种关系中，成仿吾看取的是 $\frac{df}{dF} > 0$ 这一种，与夏目漱石的 $(F+f)$ 这一种是一致的。四、关于微分系数，通常的表示法是 $\frac{dy}{dx}$ 或者 $\frac{df}{dx}$ ，而没有 $\frac{df}{dF}$ 这种表示法，显然成仿吾的 $\frac{df}{dF}$ 受了夏目漱石 $(F+f)$ 的启发影响，希望以其更清楚地表示出 $(F+f)$ 的含义^[8]（第 26-38 页）。由此可见，成仿吾接受了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

成仿吾那一时期的其它作品可以佐证这一结论。在《〈残春〉的批评》中，他说：“一个文艺的作品，总离不了内容（即事件）与情绪”，这实际上是夏目漱石《文学论》中“ $(F+f)$ ”观点的一种文字表述。在论及文艺情绪时，他还以几何图形说明“情绪不可不与内容并长；因为内容增加时，情绪若不仅不与他同时增加，反而减少，则此内容之增加，不啻画蛇添足”。这种情绪随内容并长的观点，显然与《文学论》所主张的 f 与 F 的具体程度成正比例的观点相同^[6]（第 52 页）。在《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中，他称：“在文学上最效力的是关于人事，其次是关于感觉世界的，最后乃是理智的与超自然的。”这种将文学内容分为人事、感觉、理智与超自然四类的观点，同样与《文学论》相同。《文学论》将一切能够构成文学内容的成分分为四类：感觉 F 、人事 F 、超自然 F 和知识 F 。其中感觉以自然界为标本，人事以人的善恶美丑、喜怒哀乐为镜子，超自然的标本则是宗教，而知识则是以有关人生问题为标本，这是夏目漱石的独见。在这四种中，他以为感觉的要素最值得注意，它是文学最必要的因素，因为它最能唤起人们的情绪。从重要程度而言，接下来的依次顺序是人事 F 、超自然 F 和知识 F 。由此可见，成仿吾的人事、感觉、理智与超自然四类，无论是能指还是所指与夏目漱石的观点完全相同，这显然非巧合所能解释得通的。不过相同中也有区别，夏目漱石以为感觉 F 最重要，因为它是以自然界为标本的，而知识 F 位于最后，因为纯粹的知识是不可能产生强大的情绪^[6]（第 59 页）；而成仿吾则视“人事”为最效力，“感觉”次之，超自然排在最后，因为它比“理智”更难引起情绪。

三

成仿吾是如何以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的呢？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

《文学论》认为，“文学内容以情绪为主，文学靠情绪才能成立”、“情绪是文学的骨子”^[6]（第 66 页）。这里的情绪，就是 feelings^[6]（第 42 页），亦可译成情感。成仿吾借用这一话语审视、质疑了“五四”初期诗歌。他说：“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文学始终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他终始。”落实在诗上，则“不仅诗的全体要以他所传达的情绪之深浅决定他的优劣，而且一字一句亦必以情感的贫富为选择的标准”。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剖析了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周作人的《所见》等早期白话新诗，认为它们未能写出真情，无法激起读者的情绪，所以由它们所构成的“五四”初期诗坛

只不过是“一座腐败了的王宫”，一座遍地野草丛生的可悲、可痛的王宫^{〔8〕}(第 26-38 页)。

对当时周作人介绍、倡导的日本小诗，以及受日本小诗影响而成为诗坛时尚的中国“五四”初期小诗，他尤为不满。他说：“最初我听了这个名字时，很有点不明白周君所指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就是日本的和歌与俳句。”而情绪为文学中心的原则，决定了他对这种日本小诗不屑一顾，因为它们“可称为抒情诗的究是极小数”。何以如此？理由在于，“日语是多音节的，往往一个名字占四五个音，如杜鹃一个名字，在日语占五个音，莺一个名字，占四个音之类，和歌一首为五七五七七的三十一音，俳句更只五七五的十七音。以这样少数的语音，要写出抒情的诗句，在和歌或犹易为，在俳句却实很困难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夏目漱石所谓的 F 与 f 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对象给我们的印象的焦点”与“这印象的焦点或外包所唤起的情绪”间的关系问题。成仿吾在质疑俳句论证其难以成为抒情诗时，就是从这种关系角度立论的：“1、音数既经限定，字数自然甚少，结果难免不陷于极端的点画派(Punktierkunst)。2、同时又难免不陷于极端的刹那主义(Momentanismus)。3、容积既小，往往情绪的负载过重。4、刹那主义与点画的结果，最易陷于轻浮。”这四层的共同之处由第三层道出，即容积小难以负载过重的情绪，就是情绪没有相应的支撑物，也就是夏目漱石《文学论》中所谓的“仅有 f 而找不出与其相当的 F”，这样所抒发的情感大都陷于轻浮，其诙谐也多是浅薄的。所以，成仿吾不理解周作人何以要倡导介绍日本小诗，何以要让小诗来“蹂躏”中国诗坛^{〔8〕}(第 26-38 页)。

质疑小诗论述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同时，成仿吾还谈到小诗不易译为汉语，并举出周作人所译芭蕉的名句——“古池——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认为它将诗的生命也译掉了：“青蛙的‘青’字是周君添的蛇足。俳句以粗略(Simple or rough)见长，添上一个青字，亦不能于整体的情绪有所增加，倒把粗略的好处都埋没了。水里的声音的‘里’字，也是周君添的蛇足，把原文的暗昧的美点也全失了。”成仿吾这里的“蛇足”之论，其依据是夏目《文学论》中所谓的有 F 而无 f 之观点。成仿吾批评的主要是俳谐，但如他自己所言，“关于俳谐所说的话，大抵都可以应用于和歌”^{〔8〕}(第 26-38 页)。

对日本小诗的质疑，实际上就是对“五四”初期译介日本小诗、创作上模仿日本小诗的“小诗热”的质疑，这一点成仿吾说得很清楚：“现在流行的小诗，不必尽是受了周作人的影响，然而我关于俳句所说的话，是可以应用于别的短诗的。”^{〔8〕}(第 26-38 页)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坪内逍遙在《小说神髓》中认为，小诗是未开化社会的诗歌，只用 31 个音节无法表现出近代人复杂的情感，“所以还不能成为完全的诗”^{〔9〕}(第 25 页)。而深受《小说神髓》影响的周作人却极力倡导小诗，认为“这多含蓄的一两行的诗形也足备新诗之一体，去装某种轻妙的诗思，未始无用”^{〔10〕}(第 133 页)。夏目漱石《文学论》肯定俳句、和歌的单纯、精炼，而成仿吾却运用《文学论》中情绪为文学骨子的观点，对和歌、俳句作了完全的否定。这一错位现象可以归结为文学跨语际接受影响中个人因素的作用。正是这一作用，使得不同时期乃至同一时期对异域某一文学的接受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态势，并一定程度地促使本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趋向。

(二)以《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的哲学化潮流

《文学论》认为，人们所经验的印象和观念有三种，第一种是“有 F 而无 f 的时候，即有智的要素而缺情的要素”。这种智的要素“仅作用于我们的智力，丝毫不叫起我们的情绪”。而文学以唤起读者情绪为主要目的，所以智的要素“不能视为文学的内容”^{〔7〕}(第 1-3 页)。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开篇有相似的言说：“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理智与情感在文学那里是一种矛盾关系，理智不仅难以引起人的情绪反应，而且还会破坏情绪的抒写。诗歌尤其如此，理智是诗“不忠的奴仆”，“是不可过于信任的”。诗“只在运用我们的想象，表现我们的情感。一切因果的理论与分析的说明是打坏诗之效果的”，“中了理智的毒，诗歌便也要堕落了。”所以，“我们要发挥感情的效果，要严防理智的叛逆！”这种关于理智、情感与文学关系的话语，基本来自《文学论》。

接下来，他依据这些话语对“五四”时期的哲理诗作了严厉的质疑、批评：“五四”哲理诗人“把哲理夹入诗中，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哲理诗为目的去做，便更是不对了”，“理论的或概念的，与过于抽象的文字，纵列为诗形，而终不能说是诗”。因为它们“使我们看了，如象在读格言，如象看了一些与我们不常会面

的科学书籍,引不起兴致来”,也就是无法激起我们的情感。“我只觉得宗君不过把概念与概念联络起来,而冰心亦不过善于把一些高尚的抽象的文字集拢来罢了”^[8](第26-38页)。它们只具有智的要素而不具备情的内质。这段评说颇似夏目漱石《文学论》中探求华兹华斯《义务颂》第一节失败原因的一段文字,即“远离了诗的本质,只不过是搜罗高尚的文字而已”,“具体的成分减少到极端就像是康德的论文、黑格尔的哲学讲义,或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不能使我们产生丝毫的兴趣”^[6](第52页)。对这种哲理诗倾向,成仿吾深表不安,他说:“多少朋友们的活力已经消耗在这两种倾向之下了!我们如不急起而从事防御,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怕不要在这两种倾向之间沉滞起来了?”^[8](第26-38页)

站在夏目漱石《文学论》的话语立场上,成仿吾不只是将质疑、批评矛头对准哲理诗,对于当时借小说阐释人生哲学的倾向,他同样深表不满。在《评冰心女士的〈超人〉》中,他将《超人》“热有而力实不足”的原因,归咎于行文的抽象化,并警告青年作家:“不要再想在现在的一般人的言论里面,织入高深的思想”,因为“一个作品的戏剧的效能,不能靠抽象的记述,动作 action 是顶要紧的,最好是把抽象的记述投映 project 在动作里”。也就是将抽象的记述具体化,因为按《文学论》所论,情绪 f 很难生成于抽象的“智”。他常常言说类似观点:“由鲜美的内容与纯洁的情绪调和了的诗歌,是我们所最期待的”^[8](第26页),“一个文艺的作品,总离不了内容(即事件)与情绪”^[11](第8页),也就是强调 F 与 f 的同在,即以(F+f)模式为文学最理想的内容。从这一角度看,抽象的记述具体化是他依据《文学论》中(F+f)观点质疑“五四”初期文学哲理化时探寻出的一种救治方案。

(三)以《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于科学的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潮流

《文学论》认为,科学家写真的目的在于概括、综合的科学性,以发现法则、规律,所以不需要色彩、音响和感情,而文学家写真则力图赋予物体以真实的生命;科学家以与感觉、情绪无缘的独特符号记述事物,而文学家的目的则在于真实地写出感觉和情绪。就是说文学上的写实不同于科学式的临摹,它必须对生活进行重新加工、锤炼,它的语言是经过熔炉反复加工锤炼才铿锵有声地落于纸上,和街头巷尾寒暄言辞断然不同^[6](第51-117页)。

成仿吾接受了这种写实观点,他说:“我们已与现实面对面。我们要注视着它而窥破它的真相。我们要把它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然而我们于观察时,要用我们的全部的机能来观察,要捉住内部的生命,而不为外部的色彩所迷;我们于表现时,要显出全部的生命,要使一部分的描写暗示全体,或关连于全体而存在。”而“五四”文坛庸俗的现实主义者,“作的只是一些原色写真与一些留声机片。所谓庸俗主义虽亦以写实自夸,然而他的‘实’仅是皮毛上之‘实’”^[12](第2页)。所以成仿吾主张“既要顾及实情,又要不堕入浅近的自然派的临写”,然而,“五四”一些作品中却充满着这种自然派的“临写”,未将“藏在表面下深处的实在看出来”,“为客观的现象所蒙蔽”。即便是《超人》这种抽象化倾向很强的作品,也不乏这种缺陷,“譬如写何彬的否定的时候,作者的描写只是一些客观的可见的现象;主观的心的现象,少有提起”,观察不深,“不出客观的现象以外,反被客观的现象瞒过了”^[13](第14页)。怎样医治这种庸俗写实的病症呢?成仿吾谈到了事实与情绪的关系问题:“在一定长的篇幅,事实与它所引起的情绪,都有一定限。叙述的事实过多,最易流于庸俗;事实所引起的情绪过浓,亦每陷入感伤主义。”^[12](第4页)所以,理想的作品便是事实与其所引起的情绪之间关系谐调,即夏目所谓的 F 与 f 的关系处于一种正常状态。

成仿吾借鉴《文学论》的基本话语,以现实问题探索为主,将理论话语化入具体问题的论说中,而非生硬的话语搬用,亦非纯理论辨析,借鉴是成功的。我们不能夸大成仿吾那些质疑、批评对于“五四”文学发展走向的作用,但由于它针对的是当时文坛最严峻的问题,所以它对于文学创作走出哲学化倾向,走出自然主义误区,以回归于现实主义,应该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小诗的淡出则与之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1] 吴福辉. 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Z].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 胡适. 易卜生主义[A]. 王永生. 中国现代文论选:第1册[Z].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 [3] 洪 深.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Z].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4] 钱理群. 周作人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5] 温儒敏. 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6] 何少贤. 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M].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
- [7] [日] 夏目漱石. 文学论[M]. 北京:神州国光社, 1931.
- [8] 成仿吾. 诗之防御战[A]. 吴宏聪, 等. 创造社资料:上[Z].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 [9] [日] 坪内逍遥. 小说神髓[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 [10] 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11] 成仿吾. 《残春》的批评[J]. 创造季刊, 1923, 1(4).
- [12] 成仿吾. 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J]. 创作周报, 1923, 6(5).
- [13] 成仿吾. 评冰心女士的《超人》[J]. 创造季刊, 1923, 1(4).

(责任编辑 何良昊)

To Suspect May 4th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Others Discourses

FANG Chang-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FANG Chang-an (1963-), male, Professor, Doctor supervi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As a writer of the Creator's Society, CHENG Fang-wu gave a strong suspicion against May 4th literature by quoting the discourses of *On Literatures* of Natsume Sosekei. Firstly, he doubted the world of early May 4th Poetry and the Little Poetr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entering feeling on literature in *On Literatures*. Secondly, he criticized what early May 4th literature philosophize by quoting the discourses that one's sense can't rouse one's emotion of *On Literatures*. Thirdly, he according to the discourses of *On Literatures* on differences between truthfulness of literature and truthfulness of science denied the vulgar realism of May 4th literature that was caused by Japanese naturalism literature. So he searched after the way to extricate May 4th literature from the predicament.

Key words: CHENG Fang-wu; *On Literatures*; suspect; May 4th literature